



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

社会资本与青年幸福感

Social Capital and
Youth Well-being

徐岩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资本与青年幸福感

Social Capital and
Youth Well-being

徐岩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资本与青年幸福感 / 徐岩等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2

(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3885 - 7

I. ①社… II. ①徐… III. ①社会资本 - 关系 - 青年 - 幸福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2557 号

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

社会资本与青年幸福感

著 者 / 徐 岩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张建中 王 蕾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885 - 7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2YJC840048）
的最终成果。

第一作者徐岩独立完成了第一章至第六章的内容。本书第七章为第一作者与邱智纬合作，第八章为第一作者与陈力煜合作。第一作者在两者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完善。邱智纬和陈力煜为第一作者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当时作为实习生进入个案所在学校，第一作者对她们的专业实习进行督导。后续两部分的原始材料均来自学校社会工作实习过程。邱智纬和陈力煜在排名上不分先后，并列为本书第二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一 青年的界定	1
二 研究的时代背景	5
三 研究的理论背景	8
四 本书的结构	22
第二章 幸福的概念与理论	28
一 幸福的概念发展	28
二 幸福感的界定	34
三 幸福感的现代理论视角	39
四 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因素	53
第三章 发展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幸福的作用	68
一 社会资本概念在儿童与青年领域的延伸	68
二 社会资本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	71
第四章 青少年社会资本研究的局限性	82
一 “社会资本”概念的操作性争议	82
二 缺乏“主体”视角的研究	84
三 缺少历史与文化变迁的视角	85
四 忽略社会资本的“阴暗面”	87

第五章 大学生性格特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关系	89
一 研究缘起	89
二 研究框架与假设	93
三 数据来源	95
四 变量与测量工具	96
五 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方法	100
六 研究结果	103
七 讨论	112
八 小结	123
第六章 青年劳动力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	127
一 研究缘起	127
二 研究内容	129
三 研究假设	133
四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34
五 研究结果	136
六 讨论	144
七 小结	151
第七章 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L”的个案分析	154
一 问题的提出	154
二 研究问题	157
三 研究视角与方法	157
四 L的日常生活——危机四伏	164
五 L的帮派生活	185
六 后帮派生涯——浪子能否回头	197
七 社会工作干预建议	203
八 本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206

第八章 社会资本与身份认同：云志的个案分析	209
一 问题的提出	209
二 身份认同理论回顾	212
三 偏差行为的界定与研究	218
四 研究方法	221
五 云志的社会资本现状	226
六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身份认同	238
七 社会工作介入的思考	253
八 小结	261
结 语	263
参考文献	266
附件一 大学生幸福感调查问卷	298
附件二 云志的图片	307
致 谢	312

第一章

引言

一 青年的界定

“青年”（Youth）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称谓。要了解“青年”的含义，必须先从人生阶段的划分与研究说起。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者将18岁左右及以下的这段时期都统称为儿童期。在儿童期内，又可以进行细分，分为儿童早期、儿童中期和儿童晚期。12岁之前一般可称为童年期，这段时间往往也包含了婴幼儿期。从12岁到19岁左右这段时间可以称为青春期，个体除了生理上会经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心理上也开始从童年向成年过渡，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人生阶段。成年期则是人生中跨度最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分为成年早期、成年中期和成年晚期。成年早期从20岁到35岁或40岁左右，成年中期从35岁或40岁左右到60岁或65岁左右，而成年晚期则一般指老年期，是人生历程的尾声（迈尔斯，2009；黄希庭、郑涌，2015）。需要注意的是，对人生阶段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在对人生阶段的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霍尔（G. S. Hall，1904）在一个世纪前就对“青少年期”（Adolescence）进行过年龄界定，他认为“青少年期”是从14岁至24岁，伴随着生理成熟，并且其是由社会独立过程所带来的紧张而导致的，具有“暴风骤雨般压力”的时期（迈尔斯，2009：87）。霍尔的工作奠定

了青少年研究的基础 (Keniston, 1970), 使“青少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 也使人们认识到这一人生阶段的独特性。在 20 世纪前的社会环境中, 由于物质营养条件的匮乏和经济发展上的相对落后, 人们普遍比较晚地开始身体上的发育, 加之受教育的年限也相对较短, 会比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晚进入青春期, 但又更早地开始工作、结婚和生子, 完成从原生家庭独立出来的过程。因此, 儿童在经历了生理上的性勃发后就一下子进入成人世界。霍尔当时的研究是开创性的, 让人们意识到青少年时期的独特性。进一步, 伴随着社会变迁和物质生活的丰富, 现在人们进入青春期的年纪有所提前, 从 11 岁或 12 岁就已经开始, 而迈入成年的时间则可能随着接受教育的时限延长, 以及独立时间的推后而向后推移。这种从童年向成人迈进的时间延长, 使得人生阶段的划分更加复杂且充满变化。

心理学家莱文森 (Daniel Levinson) 提出了“生活结构”的概念, 并以此为核心发展出聚焦成年期发展阶段的理论 (阿什福德等, 2005: 510)。他指出, 个体在 17 岁至 20 岁走出青春期, 为成年生活做出初步的选择; 22 岁至 28 岁的时候开始在伴侣、职业、友谊、价值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做出选择; 28 岁至 33 岁可能面临着生活结构的改变, 是可能产生危机的过渡时期; 33 岁至 40 岁一般来讲会在社会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在家庭与职业方面取得属于自己的成功。

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 (Erikson) 的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将人生划分为八个阶段。他指出, 青少年时期 (12 岁至 20 岁) 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自我认同或自我同一性的问题; 成年早期 (20 岁至 40 岁) 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亲密对孤独的冲突。他也提出了年轻人的“延缓代偿”的概念, 指出工业化社会中的年轻人存在在心理上延缓进入成年期的现象 (冷熙亮, 1999), 这一时期既不是完全的青少年期也不是完全的成年早期。社会能够允许年轻人

有一个不断尝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可以延缓对成年社会角色的扮演，以及推迟成年人应承担的责任。

阿奈特（Arnett, 2000）在心理学的权威刊物《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发表文章，提出了“成人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的全新概念，具体指 18 ~ 25 岁这段时期，个体可能已经结束青春期，但又没有进入完全承担责任的成人世界。阿奈特认为，这个阶段有五个主要特点：一是认同探索；二是不确定性；三是自我聚焦；四是居间性（*Feeling in-between*）；五是可能性/乐观主义（王宁，2018）。他强调这一时期是既不属于青春期，又与成年期相区别的一个独特的人生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个人的未来还不确定，年轻人能够在恋爱、职业、世界观三个方面探索各种各样的人生可能性（段鑫星、程嘉，2007）。阿奈特关于成人初显期的主张也引起了国内社会学者的关注。王宁（2018）在分析阿奈特关于成人初显期的文章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要判定 18 ~ 25 岁或 29 岁阶段的独特性，必须把生理年龄和社会与文化关于成年人的角色和义务的集体性界定结合起来”。因此，“要强调 18 ~ 25 岁或 18 ~ 29 岁作为人生一个重要的生命阶段，不如采用准成人期”。王宁同时也强调，中国的年轻人更多地受到了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的青年研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要从中国国情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充分考虑包括城镇化、人口流动、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在个体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在 1970 年发表了“青年：人生的新阶段”（*Youth: A “new” stage of life*）一文。他认为，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期”，都不能确切地描述美国现代社会中的年轻一代，尤其是那些仍在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但又似乎度过了青春期的年轻人。“青年”则比较好地反映了介于青少年与成年之间的人生阶段（Ken-

iston, 1970)。他将青年定义为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之间不断进行角色实验的一个转折时期（冷熙亮，1999）。凯尼斯顿总结了青年阶段的主要特点。他指出，青年具有自我与社会的张力，他们拒绝社会化，有独特的同一性，这段时期充斥着矛盾、不和、试探、变动，甚至是对死亡的恐惧（却常常表现为对生命的终结——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恐惧）（Keniston, 1970）。然而，他并没有对“青年”做出一个明确的年龄界定，而是主张青年应该是一个心理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青年”边界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可见，学术界对青年的界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人们对青年的理解会依据社会文化背景与应用场域的不同而存在差别。而在应用层面，不同的角度对青年的年龄界定也不相同。冷熙亮（1999）在他的关于当代青年的年龄界定的文章中，对此有着非常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从生理发育的角度，把青年看作生殖能力的成熟阶段，把生理发育和性特征作为年龄划分的标准，青年的年龄界限定为14~22岁；从心理发展的角度，认为青年的年龄界限与心理成熟过程一致，始于自我意识的萌发，而以自我意识的形成为终结，将14~25岁界定为青年（也有以13~25岁为青年的）；从社会化的角度，认为青年是从依赖成人的童年到能进行独立的负责的成人活动的过渡，人生与青年期的告别是以参加劳动、经济上独立、建立家庭等对社会的最终适应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稳定作为划分标准，年龄下限与生理学、心理学的划分一致，上限则由于青年概念外延的扩大而延至35岁，甚至扩大到40岁……”

从政策法规层面上来看，对青年年龄界限的划分也不一致。我国法律一般将18岁作为划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界限。共青团员规定的年龄范围为14~28岁。我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则将15~34岁年龄组定为青年人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青年应包括 14 ~ 34 岁的人口。而世界卫生组织将青年上限年龄延至 44 岁（冷熙亮，1999）。2017 年 4 月颁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 2025 年）》^① 中，则将青年的年龄明确界定为 14 ~ 35 周岁，并指出规划中涉及婚姻、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时，年龄界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青年的年龄边界并非僵化不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物质进步不断演进的概念。并且，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中，不同应用场域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都可能在青年年龄界定上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对于青年的年龄界定并不相同，不同的实践领域对青年阶段的划分也不尽相同。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青年自身的特点，以及本书中各研究的具体目的，我们主要涉及青年中 14 ~ 25 岁以下这部分群体，其中包括青少年与成人初显期两个主要阶段，并且由于 14 ~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往往可以纳入儿童的范畴，在本书后续部分，可能会在不同章节段落处选择使用与行文内容最适合的儿童、青少年或青年这三种称谓中的某一种。

二 研究的时代背景

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化发展，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发展，目的是使人民富强；第三个阶段是信息化发展时代，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幸福（苗元江，2009）。依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

① 该规划具体内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页：http://www.gov.cn/xinwen/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1。

求层次论,测量人类发展需求的指标也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初级指标是人的生存条件的满足(衣食住行、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第二层级的指标是个人的物质经济发展(包含职业发展、流动机会等与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应的指标);第三层次则是人的心理感受与精神追求的满足(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幸福感等)。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当今许多国家对社会发展指标的衡量已经从单纯考虑经济发展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转向了注重人民的精神生活与心理感受,对国民幸福的理解不仅仅局限在“好收入”,也把“好生活”与“好心情”纳入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苗元江,2011)。因此,从宏观上,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重视,许多国家和地区用GNH来代替原有的GDP来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质量好坏(沈颢、尤拉,2011)。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幸福成为国际上多领域、多学科关注的热点。

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对人民“幸福”的关注。“中国梦”离不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①。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要求“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并在关于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也强调了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性^②。

对于青年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祖国的未来属于青年,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来”“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

① 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第28页。

② 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第108~109页。

想，是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等等（转引自韩喜平、周颖，2016）。“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① 青年群体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②

2017年颁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具体阐释了青年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当前青年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就包括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以及预防青少年犯罪、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规划也提出，要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全面参与基层社区社会工作，重点在青少年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犯罪预防等领域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全新阐述，强调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对生活的追求不仅仅局限物化的量的追求，也开始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是新时代人们更加关切的问题。另一方面，由经济迅猛发展而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以及社会差异问题也随之凸显。因此，在新时

① 见《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人民日报》，2013-05-05。

② 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第56页。

期，对影响青年成长与发展的社会性因素，尤其是针对导致青年群体各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社会资本研究就显得分外重要。

可见，在强调社会治理与和谐发展的大背景下，开展青年研究尤为必要，能够促进社会学者更好地审视因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家庭资源分配和投入不均衡给青年的健康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采用资本视角来探讨青年“幸福感”的研究就显得更加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 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幸福”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维度

幸福研究属于交叉性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都在研究幸福。当代幸福感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心理学家 Diener（2000）曾指出，社会必须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来重视对幸福的研究，而人们则需要科学地理解生活质量并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苗元江，2011）。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认为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着手讨论幸福（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第一个方面是人们的积极体验，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观幸福感、乐观、快乐等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聚焦积极的人格因素，这部分主要集中在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积极期望、智慧、良好适应等方面。第三方面是探讨人们产生积极认知和情感体验所依赖的社会情境，这部分涉及人际关系、文化与社会规范、家庭与社区等多方面的内容。总之，幸福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帮助人们获得幸福，使儿童健康成长，使家庭美满，使工作者心情舒畅，使社会公众称心如意。

“幸福”不仅仅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学者

们都尝试对人们感受到的幸福给予科学的定义，并探讨幸福获得的机制。如前所述，社会学、经济学与心理学领域都从不同角度对幸福进行了研究，这里面既有区别又有交叉融合。经济学更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对人们幸福的影响；社会学更加重视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对幸福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总体上来说，幸福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以积极的方式体验生活。我们研究幸福、监控幸福的目的是提升幸福感。有些人可能会疑虑，太多的满足会让人们失去动机，太多的愉快会导致享乐主义。但是至今的所有证据显示，高幸福感的群体具备更多好的素质，快乐的人们参加更多的社区组织、更喜欢他人，较少离婚、比较长寿、工作成绩更好、有更高收入、更具创造力与社会性、对社会贡献更多（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对幸福的研究最初集中在“谁是幸福的”这一问题上，而现在学者们更关注“什么时候最幸福”“为什么会幸福”“幸福的过程如何”“怎样会幸福”等问题。换言之，研究的重点越来越倾向于幸福的机制，讨论可能的理论模型即影响幸福感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心理学上关于幸福的探讨也开始从特质论逐渐拓展到建构论的视角。建构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各种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环境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的认知加工。因此，幸福感是个人特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对幸福的研究更侧重于反映人们在其所处社会环境中拥有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自身幸福的社会资源。现有研究已经证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金钱与财富对人们幸福感的体验就失去了强大的影响力。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价值观与信仰等因素对人们幸福感体验的影响则相对增强（苗元江，2009）。